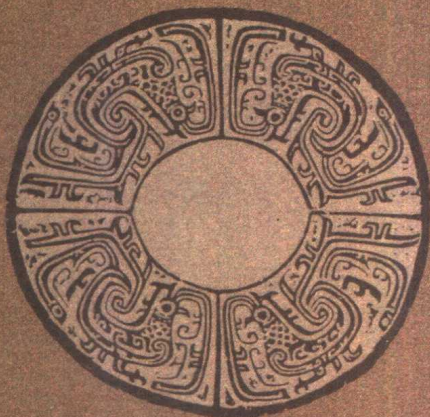


# 与晚明文学思潮

上海书店出版社

# 儒释道

周群 ● 著



# 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

周 群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周群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3

ISBN 7-80622-020-8

I.儒... II.周... III.文学-文艺思潮-研究-中国-明代 IV.I20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14357号

**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

周群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424号 邮编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1.5 字数286千字

2000年3月第1版 200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80622-020-8 / I·4

定价: 22.50元

# 序

卞孝萱

1986年,周群同志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执教。1989年,考取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攻读明史。1991年,获硕士学位。同时考取中文系博士生,研修文学史。1993年,获博士学位。他以两年半的时间,撰成博士论文,又以两年半的时间,将博士论文进一步充实、提高,撰成《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专著。近十年来,我与他接触甚多,对他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融会中西的治学方法,深为赞赏。现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已接受他的书稿,即将梓行,老怀欣慰,命笔为序。

首先,我将此书的研究重点介绍给读者。周群同志研究的重点是晚明文学思潮与儒释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对前者本身的系统研究,因为文学不但受到哲学、宗教的影响,还受到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学本身发展规律等因素的制约。

他选择这一课题进行研究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晚明文学思潮是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而这种启蒙思潮与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主要是借助于对传统儒释道思想作新的诠释而实现的。因此,要研究个性解放思潮对文学的影响就不可回避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晚明文学思潮的高涨时期正是佛教盛行之时,李贽、焦竑、袁宏道等人还对佛教有深刻的研究。人们过去主要是将佞佛之风的盛行与文学革新锐气的

减弱相联系,强调佛教作为遁逃藪的作用,而对佛教与正统思想相悖的方面给晚明文学思潮的启迪作用认识不足。过去的研究往往强调了晚明文学思潮与正统儒学的对立方面,而往往忽视了在明代中后期称盛的儒学固有的狂者精神对晚明文人心态的影响。

其次,介绍一下此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往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学批评史、文学史的纵向角度,而对其与同时代的文化背景之间的横向关系研究不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晚明文学思潮研究的深入。此书采取了以下三种研究方法:

一、文学与哲学等学术思想相结合。这是由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特质决定的传统的研究方法。儒释道影响于晚明文学思潮本质上是其哲学思想。晚明文学思潮的核心是理论批评,这与以文学作品为研究核心的文学史有一定的区别,虽然创作与理论批评是不可分割的,但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方法及重点应有所区别。哲学对文学理论的影响比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更为直接。

二、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相结合。这是由创作与批评之间固有的联系所决定的:一方面,中国古代文论虽然也有系统的理论著作,但更多的则散见于尺牍、叙跋乃至诗歌等文学作品之中。如袁宏道的诗禅之论主要是通过诗歌表现出来的。另一方面,作品是作家文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又深化和丰富了其文学思想。汤显祖的“至情”论便是在创作《牡丹亭》时所写的《牡丹亭记题词》中提出的。但是,此书所说的文学思想与作品之间的结合,仅限于同一作者的文学思想与作品间的互证,因为纯粹从作品中“开掘”出的文学思想,难免带有研究者见仁见智的偏颇看法。因此,此书对缺乏文学思想的作家的作品一般不予讨论。

三、文人性格与审美情趣相结合。古语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文人性格对文学思想、审美兴趣有着深刻的影响。晚明文学思潮则是在一大批具有傲岸不羁、“伉壮不阿”的个性解放精神的狂狷之士的鼓荡之下形成的。从文人的心态、性格方面研究,可以

NAZP6/07

加深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理解。

再次,向读者介绍此书的主要内容。周群同志以李梦阳、唐顺之、王世懋、屠隆等人的文学思想标志着革新思潮的酝酿期,以徐渭、李贽、焦竑、汤显祖、袁宗道、袁宏道、陶望龄等人的文学思想标志着革新思潮的高涨,以袁中道、钟惺、谭元春、冯梦龙等人的文学思想显示了对革新思潮的修正。由于文学思潮不同于一个时代的文学随着王朝的更替而起始那样具有确定的时间界限,因此,对于晚明文学思潮的兴衰及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此书以文学批评家的文学思想特质第一、时间界限第二的原则进行区分。如王世懋、屠隆的生卒年均都在徐渭之后,但由于徐渭的文学思想与李、汤、袁等人十分相似,他们都代表着高涨时期的成熟思想,王、屠诸人的性灵之论,对袁宏道有着深刻的影响,但王、屠都具有所谓“沿王、李之涂饰,而又兼三袁之纤佻”<sup>(1)</sup>,由格调而及性灵的过渡特征,此书将王世懋、屠隆列于酝酿时期,徐渭列于高涨时期进行论述。

晚明文学思潮中的文学批评家和作家虽然人数很多,但由于明代文坛每每新论乍起,则“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sup>(2)</sup>,即使倡言“各极其变,各穷其趣”<sup>(3)</sup>的公安派亦不能免。基于这样的原因,此书重点研究的是晚明文学思潮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批评家和作家。

最后,郑重介绍此书的新颖观点。周群同志提出,儒释道名曰三教,但影响于文学,尤其是文学思想的,主要是其学术思想而非宗教践履。儒释道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体现出的特点也稍有区别。影响于晚明文学思潮的儒学,是以左派王学为主而带有“异端”的色彩,佛教以禅、净二宗为主,而道家及受道家影响的魏晋名士风流比道教的影响更大。

晚明文学思潮是受到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而高涨的。其间具有代表性的文人虽然文学主张、作品风格各有偏胜,但

一般都主张文学应“疏瀹心灵，搜剔慧性”<sup>〔4〕</sup>，抒写真情，崇尚信腕直寄的创作风格，推重间阎之诗、小说戏曲等民间俗文学。他们既反对七子派拘守古法高格、摹拟前人的偏颇之论，又吸取了李梦阳、王世懋、屠隆等人关于“真情”、“性灵”及提倡民间俗文学的文学思想。李、王、屠等人与唐宋派的部分思想为晚明文学思潮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准备。徐渭、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人以基本一致的文学观念互相推挹，形成了晚明文学思潮的高峰。钟惺、谭元春及冯梦龙等人，或注重师心与师古的结合，或着意于“真情”与儒家教化之间的联系，但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徐、李、汤、袁等人的文学思想，对其“矫枉过直”之论又有所修正。

总之，此书从对哲学、宗教思想的研究入手，圆满地论证了晚明文学思潮产生的理论渊源，起点高，视角新，资料丰，析理透，是周群同志的力作。此前，他已出版了《刘基评传》（列入《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和《充溢文苑的爱国精神》（列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丛书》）二书，不久还有第四部学术著作问世。周群同志正在英年，希望他继续努力，精进不已，勇攀一个又一个新的学术高峰。

一九九六年冬于南京大学

- 
- 〔1〕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九《由拳集》提要。  
〔2〕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序》。  
〔3〕 《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诗》。  
〔4〕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袁稽勋宏道》。

## 内 容 提 要

晚明文学思潮是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而后者又是借助于对传统儒释道思想作新的诠释而实现的。选择这一课题,旨在开拓对晚明文学思潮研究的新视角。与一般从文学批评史、文学史的纵向角度研究晚明文学思潮不同,本书侧重于从同时代的宗教、哲学对晚明文学的影响这一横向研究,并注意文学与哲学、理论批评与创作、文人性格与审美情趣之间的结合。本书研究的是晚明文学思潮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批评家、作家。



# 目 录

|   |     |
|---|-----|
| 序 .....                                       | 卞孝萱 |
| <b>第一章 概论</b> .....                           | 1   |
| 第一节 晚明三教特色及晚明文学思潮概况 .....                     | 3   |
| 第二节 三教对晚明文学思潮的影响概略 .....                      | 10  |
| <b>第二章 理学到心学的嬗变:晚明文学思潮的酝酿及其学术根源</b> .....     | 27  |
| 第一节 理学到心学的嬗变与李梦阳等人的非常之论 .....                 | 27  |
| 第二节 王畿“灵明洒脱”的良知说与唐宋派以意为本、“直摅胸臆”的文学主张 .....    | 35  |
| 第三节 心性理论与王世懋、屠隆等人对性灵的重新诠释 .....               | 43  |
| <b>第三章 学宗王门、兼取佛学:徐渭的文学“本色论”及文学思潮的兴起</b> ..... | 69  |
| 第一节 承学王门与自然求真的文学理论 .....                      | 70  |
| 第二节 佛禅与文论 .....                               | 90  |
| 第三节 “真我”的艺术显现:《四声猿》与徐渭的“奇”情逸性 .....           | 97  |

|                                      |     |
|--------------------------------------|-----|
| <b>第四章 出入三教、高张个性:李贽的文化心态与</b>        |     |
| <b>“童心说”、“化工说”</b> .....             | 111 |
| 第一节 李贽的文化心态与“童心说”的思想渊源 .....         | 112 |
| 第二节 “化工说”与自然情性论 .....                | 124 |
| 第三节 “童心者之自文”:“下笔无状”的作品 .....         | 132 |
| <b>第五章 融通儒佛、以儒为本:</b>                |     |
| <b>焦竑亦“灵”亦“实”的文论</b> .....           | 140 |
| 第一节 融通儒释与反对模拟 .....                  | 141 |
| 第二节 儒学精神与尚实之论 .....                  | 146 |
| 第三节 “性灵”及其理论奥援 .....                 | 153 |
| 第四节 冲融雅润的诗文 .....                    | 156 |
| <b>第六章 “可上人之雄”、“李百泉之杰”:汤显祖的“尚情论”</b> |     |
| <b>及革新派的创作高标——“临川四梦”</b> .....       | 168 |
| 第一节 “幼得于明德师”、‘听李百泉之杰’与文学情感论<br>..... | 169 |
| 第二节 “紫柏禅”与后期作品中的矛盾心态 .....           | 182 |
| <b>第七章 论学宗儒、论文尚本:公安派先驱袁宗道</b>        |     |
| <b>重“学”平允的文论</b> .....               | 196 |
| 第一节 首开公安派之骅骝 .....                   | 197 |
| 第二节 培本尚学与冲和允洽的文学革新论 .....            | 202 |
| 第三节 清润婉妙的诗文 .....                    | 212 |
| <b>第八章 错综三教、出入禅净:公安派主将袁宏道</b>        |     |
| <b>的“性灵说”与晚明文学思潮的高涨</b> .....        | 221 |
| 第一节 前期的学术倾向及“性灵说”的提出 .....           | 222 |

|             |                            |     |
|-------------|----------------------------|-----|
| 第二节         | 后期学术思想的变化及尚淡尚质的美学旨趣        | 248 |
| 第三节         | 禅光佛影、老庄风韵与清俊宕逸的诗文          | 257 |
| <b>第九章</b>  | <b>学祧泰州、兼习佛禅：公安派羽翼陶望龄</b>  |     |
|             | 的“偏至说”与“内外论”               | 281 |
| 第一节         | 讲性气以反复古                    | 283 |
| 第二节         | 重才情以反复古                    | 285 |
| 第三节         | 颇得佛理禅意的诗歌                  | 291 |
| <b>第十章</b>  | <b>“中行”与禅悟：公安派殿军袁中道继踵哲</b> |     |
|             | 昆、力矫其偏的文论                  | 300 |
| 第一节         | 儒佛心性论与“性灵说”                | 302 |
| 第二节         | “中行”、佛禅与含蓄蕴藉               | 306 |
| 第三节         | 于山水自然中证悟灵慧之心               | 313 |
| <b>第十一章</b> | <b>静观默照与深幽孤峭：竟陵派对“性灵说”</b> |     |
|             | 的承嗣与新变                     | 321 |
| 第一节         | 一个屡受非议的文学流派及其学殖            | 321 |
| 第二节         | “孤行静寄”与静观默照                | 327 |
| 第三节         | 佛教“苦谛”与荒寒境界                | 331 |
| <b>第十二章</b> | <b>儒学与“情教说”：冯梦龙的通俗文学观</b>  |     |
|             | 及晚明文学思潮的消退                 | 338 |
| 第一节         | 一位尚俗的文学家                   | 338 |
| 第二节         | 本于儒学的“情教说”                 | 341 |
|             | <b>主要参考书目</b>              | 350 |
|             | <b>后记</b>                  | 357 |

## 第一章 概 论

文学与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学术思想的关系是至为密切的,尤其是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受学术思想的影响更为明显,一个有影响的学术流派之所以能够流布一时,应者云集,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具有较完备的理论体系,有一定的哲学底蕴。对此,明黄汝亨《歇庵集序》云:

文者道之器……才矜其道者,秦汉之文也;理掩其才者,宋文也。我明之有北地、信阳、历下、琅琊辈也,负秦汉之鼎而霸焉者也,其有金华、天台、毘陵、晋江辈也,握宋之符而王焉者也。<sup>[1]</sup>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晚期,古老的中华大地腾涌起了近代化的启蒙思潮。但在表现形式方面,这一思潮仍是通过传统思想作新的诠释而实现的。以其杰出的代表李贽为例,他虽然既不重训诂章句,又不依傍他人篱壁,对“至圣先师”孔子也不思膜拜,曰:“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sup>[2]</sup>尽管如此,他被封建卫道士目为“异端”的思想还是常常用儒道范畴、佛教名相来表达的。他谈“道”,但没有孔墨天道观中体现出的神秘色彩,与老子言“道”的义理性、自然规律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他所说的“道”是人自身的“道”,“人即道也,道即人也”<sup>[3]</sup>,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他也谈“礼”,但不是孔子那里尊卑

名分的等级制度,而是“好恶从民欲,而不以己之欲,是之谓礼”<sup>[4]</sup>,不是以统治者的意志为绳墨,而是顺从于百姓的物质愿望、精神需求之“礼”,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至于其“童心说”,则是汲取了先秦业已存在的,经禅宗及宋明理学家着意发挥了的心性理论和道家自然论的合理内容而创立的。由此可见,这种人文思潮并未蜕去儒、释、道的传统形式。晚明文学思潮也是在明代中后期思想启蒙思潮的直接影响下而产生的,同样也深受传统的儒、释、道思想的沐染,因此,研究三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揭示晚明文学的理论渊源,从其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变异中把握其“新”的特质。

文学与宗教是意识形态领域中不同的范畴,二者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文化形态。最初,这两种文化形态是融为一体的,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宗教与文学逐渐分野,前者以虚无缥缈的天国为精神追求,后者则以现实世界、现实人生为创作源泉,但其间的联系、影响仍然存在。

古代中国的宗教意识是相对淡薄的。名曰“三教”,但儒家主要是一种有关社会政治、伦理的学说,与宗教并无太大关涉。古代印度佛教是讲出世的宗教,但传至中土,尤其中国佛教产生后,则发生了由入世求解脱的变化。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虽然有于现实之外另觅仙境的宗教特点,但根本则是希望顺同自然之化,全生葆真,以此来实现长生。而道家虽然对道教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二者有明显的区别,道家是产生于先秦的一种学术思想。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三教具有上述特点,这种影响往往体现于学术思想而非宗教信仰,人生态度而非宗教践履。同时,由于三教在不同的时期体现出的特点不同,影响的程度、内容也各各有别,因此研究三教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首先要讨论不同时期三教的特点。

## 第一节 晚明三教特色及晚明文学思潮概况

### 一、晚明三教特色

由于晚明的思想界以高扬个性为特征,虽然其思想的表现仍依循着儒释道既有的范畴、名相,但是,内涵则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此,晚明期间,儒释道三教本身也呈现出了新的特色。

首先,三教合流之势更趋明显

自两汉佛教传入、道教产生始,三教之间既互争雄长,又相互汲取。宋代理学的产生与三教融合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代后期,这种融合更趋明显和深化,大多不再像宋儒那样阴取释教而阳为掙击<sup>[5]</sup>。王阳明是明代中后期为数不多的有辟佛言论的人之一,但他诋谇佛教也仅限于佛教与治世无甚补益等有限的范围内,受佛教影响乃至着意于融通儒释,是其主导的方面,他甚至以《六祖法宝坛经》做教材。<sup>[6]</sup>当门人问儒学所谓三更时分,扫荡胸中思虑,空空静静,与佛教之“静”有何区别时,他说:“动静只是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故动静只是一个,分别不得。知得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辨矣。”<sup>[7]</sup>王阳明的门人王畿以心性之学为标准来划分正统与异端,而不囿于三教门户,认为“学佛老者,苟能以复性为宗,不沦于幻妄,是即道释之儒也。为吾儒者,自私自用智,不能普物而明宗,则亦儒之异端而已”<sup>[8]</sup>。他认为“吾儒之学与禅学、俗学,只在过与不及之间”<sup>[9]</sup>,并无本质的区别。徐渭认为儒佛应互补,他说:“大约佛之精,有学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之;吾儒之粗,有吾儒自不能全,而学佛者反全之者。”<sup>[10]</sup>“卓吾李老(李贽)合和儒释”<sup>[11]</sup>。焦竑更直截了当,云:“释氏诸经即孔孟之义疏。”<sup>[12]</sup>同时期的管志道、林兆恩、何心隐等人的学术路向也基本相似。他们以儒家立场

推扬三教合流的学说,受到了佛教丛林中人的呼应,祿宏作《儒释和会》<sup>[13]</sup>、《儒佛交非》、《儒佛配合》,<sup>[14]</sup>虽然其表述不及焦竑那样率尔直言,但认为“禅宗与儒典和会”是“聪明人”<sup>[15]</sup>所为。德清则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sup>[16]</sup>德清、智旭还对《四书》、《易》、《老》、《庄》加以注释,直接继承了宋代智圆、契嵩等人的融通精神。在道教方面,明代著名道士张三丰早就说过:“窃尝学览百家,理综三教,并知三教之同此一道也,儒离此道不成儒,佛离此道不成佛,仙离此道不成仙。”<sup>[17]</sup>晚明的伍守阳(伍冲虚)则专门著有《仙佛合宗语录》。

这一三教合流的思潮产生了两种社会效果:一是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万历年间佛教大盛,除了因为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外,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前的佛教往往在儒家传统的夷夏之别的观念面前受到抑制和排击,但儒佛和会后,“诸浅识者不复以儒谤释,其意固甚美矣”<sup>[18]</sup>,佛教徒无疑欣慰有加。三教互通,尤其是心学与禅学交互作用,共同起到了冲破程朱之学禁锢的作用。事实上,心学直接诱发了禅悦之风的盛行,正如陶望龄所说:“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sup>[19]</sup>心学与禅学并无本质区别,王阳明自己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sup>[20]</sup>李贽也认为王学与佛教互通不碍,他说:“阳明先生曰:‘满街皆圣人。’佛氏亦曰:‘即心即佛,人人是佛。’”<sup>[21]</sup>二是对晚明文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大多三教兼综。李贽一方面提倡三教归儒<sup>[22]</sup>,一方面又落发为僧。袁宏道既喜欢适世之道,又说“于禅宗不敢多让”,还服膺阳明儒学,认为“一切人皆具三教”<sup>[23]</sup>。袁中道说:“道不通于三教,非道也。”<sup>[24]</sup>汤显祖则既砥砺名节,忠心侍君,又与名僧紫柏过从甚密。这种兼综的特色,不但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态度、创作实践,同时,三教融通的背后是一种宽阔的学术精神,而这正是晚明文人不拘既定格法,主张师心自运

的文学观念的思想基础。禅宗离经慢教的精神,与晚明文学中的“性灵说”、“尚情论”在与正统思想悖离这一契合点上颇有相似之处,并影响了后者。

其次,三教各自呈现出新的特色

就儒学而言,姚江之学及其左派王学风靡天下。明初占统治地位的程朱之学呈萎钝之势,“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其规模宏大,影响久远,“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sup>[25]</sup>。它与程朱之学的根本区别即在于强调心为主体的自主自律的原则,良知之不同于天理,就在于是自身所固有而非外在的规范。王门后学将这一思想端绪进一步发展到了任心适性的程度,因此,王学受到了后来道学先生的批评,谓其“荒经蔑古,纵欲败检,几至不可收拾”<sup>[26]</sup>,而这种具有反道学倾向的思想正是晚明文学思潮产生的哲学基础。事实上,晚明文学革新思潮中的代表人物,都表现了对王学的崇信,他们不但在诗文中表现对阳明的敬奉之情,还著有一些与阳明学有关的专文,如徐渭作《为请复新建伯封爵疏》,李贽有《阳明先生道学钞序》、《阳明先生年谱》,焦竑作《刻传习录序》、陶望龄作《重修阳明先生祠碑记》、钟惺作《王文成公文选序》等。晚明文人或深受这种哲学思潮的濡染,或对哲学、文学都深有造诣(如李贽等)。晚明文学思潮之所以能够廓清模拟因袭的陋习,与其受阳明学的影响而具有较完备的理论形态不无关系。

就佛教而言,具有两方面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佛教呈复兴气象,尤以居士佛教为甚。明初,朱元璋“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袍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sup>[27]</sup>。不难看出,朱元璋对佛教是至隆极重的,佛教各派在明初都有一定的发展。虽然成化间方士李孜省、邓常恩等曾被朝廷重用,但佛教仍十分盛行,自古佛寺之多无过于此时。但从宣宗至穆宗(1426—



1572)一百多年间,各宗都呈衰颓之势。而神宗万历期间佛教出现了复兴的气象,这一方面表现为出现了云栖祿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明末四大高僧。另一方面则是晚明的居士佛教极为隆盛,清人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凡五十六卷,其中三十七卷至五十三卷为明代居士的传记,其中万历之前的仅四人,另有正传六十七人,附传三十六人,他们都生活于万历至崇祯年间,且多为声名较著的文人学士,如举进士的就有:王尔康、黄元公、赵贞吉、黄辉、严讷、殷迈、王宇泰、董元宰、蔡懋德、虞淳熙、焦竑、朱国祚、陶望龄、杨起元、袁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钟惺等。当然,这种复兴之势与最高统治者的偏爱垂青等因素有关,神宗虽不“以意指人”<sup>[28]</sup>,但大建穹宇冠海内的慈寿、万寿诸寺,又大开经厂,对佞佛之风的盛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晚明佛教复兴正是晚明文学思潮兴盛之时,文士们出入佛禅而成为时风众势,并不仅仅是因为个人的性情所致,无疑还潜隐着必然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与王学的盛行,晚明文士多受王学的浸润有关。由于三教合一之风称盛,王学与佛禅之间互相浸润,因此,文士们常规慕阳明而又谈禅论佛,如李贽、管志道、杨贞复、陶望龄、殷时训、焦竑、瞿元立、严激、袁宏道、蔡维立、金正希等人都是如此。

第二个特点是禅净合流之风盛行。晚明佛学的复兴也仅限于禅、净二宗。被祿宏称为“本朝第一流宗师”<sup>[29]</sup>的梵琦,出世传法五十年,“内而燕、齐、秦、楚,外而日本、高丽,咸咨决心要,奔走座下,得师片言,装潢袭藏,不翅拱璧”<sup>[30]</sup>,声势十分煊赫,但是,他的种种言论如“触目无非此道,莫拣精粗大小,众生与佛何殊,总是自心所造”,“随处逍遥快乐,洞明自己真性”<sup>[31]</sup>等,都是继承了禅宗证悟自性、见性成佛的传统,并且进一步发挥了晚唐以来形成的呵佛骂祖的狂禅作风,云:“三乘十二分教,大似屎窖子。”<sup>[32]</sup>其后的德宝是临济宗的著名禅师,他将禅宗的参悟与净土的称名念佛融